

# 五代蜀地粟特系沙陀人考

胡耀飞

(复旦大学历史系 11 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 唐末五代时期, 随着黄巢之乱后的社会动荡, 引起了北方移民南下的局面。其中, 也有相当一部分粟特人和粟特系沙陀人进入蜀地。在前蜀时期, 可以找到粟特商人和伶人在蜀地的活动痕迹, 也包括部分粟特系沙陀将领入蜀。在后蜀时期, 则有更多的粟特系沙陀人随着后唐王朝灭蜀、孟知祥入蜀、后唐王朝第二次伐蜀而进入蜀地。不过, 粟特人和粟特系沙陀人在蜀地的活动并未形成较大的规模, 他们各自的人生际遇也不尽相同, 对蜀地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并不明显。

**关键词:** 五代 前蜀 后蜀 粟特人 粟特系沙陀人

## 前言

唐末五代, 随着对黄巢起义的镇压, 沙陀人崛起于河东道, 并形成所谓代北集团<sup>1</sup>。但代北集团的活动地域并非局限于代北, 随着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数十年的开拓, 沙陀人的活动空间一直在想外延伸。此外, 在南方政权, 也有沙陀人的身影, 笔者曾梳理过杨吴、南唐政权境内的沙陀人<sup>2</sup>。但相比于东南, 西南地区的蜀地由于曾经被后唐政权征服并统治过十年, 且在征蜀军队基础上建立了后蜀政权的缘故, 沙陀人当更多。然而, 五代时期的沙陀人, 其汉化程度已经很深, 特别是随着建立后唐王朝, 代北集团吸收了大量河北、河南等地的汉人加入, 甚至严格意义上的代北集团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集团内部的通婚现象, 使得民族融合更为复杂。所以, 笔者更感兴趣的是粟特系沙陀人的动向, 因以姓氏来对粟特人进行辨识更为方便, 以此作为考察沙陀人入蜀的第一步。

一个族群出现与消亡, 往往伴随着人口的流动与社会的变迁, 沙陀人在唐宋之际的发展历程, 也引起了整个华北政治与社会格局的变迁。对此, 邓小南描述了沙陀人在宋初政治环境下的消亡<sup>3</sup>, 森部丰、陈海涛·刘惠琴具体考察了粟特系沙陀武将在五代北方的情况<sup>4</sup>,

<sup>1</sup> 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 李丹婕:《评介〈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5年第3期, 第137-140页。

<sup>2</sup> 胡耀飞:《出入杨吴政权之“空间转移”:以沙陀武将为例》, (韩)任大熙主编《亚洲研究》第8辑, 2010年2月, 第67-86页; 胡耀飞:《吴、南唐政权境内沙陀人考》, 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4辑, 三秦出版社, 2012年, 第391-410页。

<sup>3</sup> 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文史哲》, 2005年第5期, 第57-64页。

<sup>4</sup> 森部丰:《唐末五代的代北におけるソグド系突厥と沙陀》, 《东洋史研究》, 第62卷第4号, 2004年, 第60-93页; 森部丰撰, 温晋根译:《唐后期至五代的粟特武人》, 《法国汉学》第十辑, 中华书局, 2005年, 第226-234页; 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6

冯汉鏞略述了唐五代时期入蜀的外国人<sup>5</sup>，荣新江、罗帅先后考察了中古时期南方粟特人的活动和遗存<sup>6</sup>，吴松弟综论了唐代西域胡人的内迁和唐后期五代北方向蜀地的移民情况<sup>7</sup>。至于粟特人在蜀地的行踪，仅有姚崇新的三篇论文<sup>8</sup>。以上研究，皆未专门关注五代时期蜀地粟特人的活动。不过也有一些相关研究，如田中整治对后蜀成立过程的考察<sup>9</sup>，杨伟立对后蜀政权兴亡的研究<sup>10</sup>，方积六等对后唐灭前蜀和孟知祥建后蜀的军事过程阐述<sup>11</sup>，何永成《孟蜀创业集团研究》<sup>12</sup>对跟随孟知祥创建孟蜀的文臣武将的研究，樊文礼关于孟知祥割据自立对代北集团所造成的削弱的关注<sup>13</sup>，顾立诚对唐宋之际四川地区自北向南移民的户口考察<sup>14</sup>，杜文玉师对后蜀禁军编制的研究<sup>15</sup>，纪宇谦在何永成基础上对后蜀创业集团的考察<sup>16</sup>。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

## 一 后唐将士入蜀人数考

欲研究五代，特别是后蜀政权时代粟特系沙陀人在蜀地行踪，首先得明晰入蜀的后唐将士之总人数及分布与流动情况，然后方能对其中的粟特系沙陀人进行追踪。因此，关于后唐征服前蜀所用军队的数量，笔者先分时间段来揭示：

### （一）灭前蜀将士

据《旧五代史》，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九月，唐庄宗下诏：

……今命兴圣宫使、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命侍中、枢密使郭崇韬充西

---

年，第 280-299 页。

<sup>5</sup> 冯汉鏞：《唐五代来巴蜀的外国人》，《文史杂志》，2006 年第 2 期，第 22-24 页。

<sup>6</sup> 荣新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韩昇主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38-152 页；罗帅：《中古时期流寓我国南方的粟特人及其遗存》，“多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史研究：2008 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生论坛”会议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8 年 4 月。

<sup>7</sup>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卷》，第 81-109、330-346 页。

<sup>8</sup> 姚崇新：《中古时期巴蜀地区的粟特人踪迹》，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69-182 页；后收入氏著《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79-299 页。姚崇新：《中古时期西南地区的粟特、波斯人踪迹——兼论西南与印度、西亚的古代交通》，氏著《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第 300-324 页；姚崇新：《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火祇教遗痕》，氏著《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第 325-347 页。

<sup>9</sup> 田中整治：《五代における后蜀国の成立过程について》，《北海道学艺大学纪要》I-B，14：2，1963 年 12 月，第 43-58 页。惜难觅此文。

<sup>10</sup> 杨伟立：《前蜀后蜀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年，第 95-163 页。

<sup>11</sup> 方积六：《五代十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17-124、216-223 页。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册《五代》，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 年，第 177-197 页。

<sup>12</sup> 何永成：《孟蜀创业集团研究》，《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 年，第 851-890 页。

<sup>13</sup> 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 234-238 页。

<sup>14</sup> 顾立诚：《走向南方——唐宋之际自北向南的移民与其影响》，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4 年，第 120-133 页。

<sup>15</sup> 杜文玉：《前后蜀兵制初探》，《江汉论坛》，2004 年第 11 期，第 91-97 页；收入氏著《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470-487 页。

<sup>16</sup> 纪宇谦：《前后蜀创业集团暨中央权力结构之研究》，中兴大学硕士论文，2007 年。

川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充西川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凤翔节度使李曦充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充行营招讨副使，陕府节度使李绍琛充行营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西京留守张筠充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充行营左厢马步都虞候，邠州节度使董璋充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严充西川管内招抚使，总领阙下诸军，兼四面诸道马步兵事，取九月十八日进发。<sup>17</sup>

从这段话中，可以了解到后唐灭前蜀的军队至少有八种来源，郭崇韬率禁军，高季兴率荆南军，李曦率凤翔军，李令德率同州军，李绍琛率陕府军，张筠率西京军，毛璋率华州军，董璋率邠州军。而由魏王继岌都统之。客省使李严非将领，自无统兵。

又据《资治通鉴》可知：

庚子，以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军事悉以委之。……将兵六万伐蜀，仍诏季兴自取夔、忠、万三州为巡属。都统置中军，以供奉官李从袭充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高品李廷安、吕知柔充魏王府通谒。辛丑，以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并参预都统军机。<sup>18</sup>

如此，则伐前蜀将士共六万人，且魏王继岌也有自己的“中军”，并置属官。但事实上，军事悉委郭崇韬，《通鉴》曰：“初，帝遣宦者李从袭等，从魏王继岌伐蜀，继岌虽为都统，军中制置补署，一出郭崇韬。崇韬终日决事，将吏宾客驱走盈庭，而都统府惟大将晨谒外，牙门索然，从袭等固耻之。”<sup>19</sup>因此，魏王继岌的中军能直接调动人数不会很多。当然，由此造成的日后郭崇韬被杀，则祸实基于此。

另外，在这六万人之外的高季兴所率荆南军远在东南方，与郭崇韬之伐蜀主力并不在一起，而是自己行动。但因为荆南军始终没有取得对夔、忠、万的占领，并且荆南军原是后梁太祖朱温的人马戍荆南者，据考察也没有沙陀人<sup>20</sup>，故可排除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

在这六万人中，可以明确有沙陀人的，属行营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李绍琛所统，正如其称谓“蕃汉”所示。李绍琛本人也是康延孝改名而来，其为“塞北部落人也”<sup>21</sup>，属于粟特系沙陀人。又据《通鉴》，“冬十月，排阵斩斫使李绍琛与李严将骁骑三千、步兵万人为前锋”<sup>22</sup>，则李绍琛所将骑兵 3000 人，相信有沙陀骑兵在内。只不过李绍琛早年投梁，中年虽“率百骑来奔”<sup>23</sup>，但久在河南，与塞北部落往来当不多。当后唐庄宗赢得天下后，

<sup>17</sup>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 33《庄宗纪七》，中华书局，1976 年，第 456-457 页。

<sup>18</sup>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73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九月条，中华书局，1956 年，第 8936-8937 页。

<sup>19</sup> 《资治通鉴》卷 274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十一月条，第 8947 页。

<sup>20</sup> 曾育荣：《高氏荆南史稿》，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 年，第 118-133 页。

<sup>21</sup> 《旧五代史》卷 74《康延孝传》，第 967 页。

<sup>22</sup> 《资治通鉴》卷 273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十月条，第 8938 页。

<sup>23</sup> 《旧五代史》卷 74《康延孝传》，第 967 页。

也不可能再有纯粹的沙陀部队的存在。这 13000 人，除了入蜀后在攻占的地方依次驻守外，十月辛巳，“王衍……遣步骑三万逆战于三泉，（康）延孝与李严以劲骑三千击之，蜀军大败，斩首五千级，余众奔溃。”<sup>24</sup>十一月时，李绍琛进至绵州，“乃与（李）严乘马浮渡江，从兵得济者仅千人，溺死者亦千余人，遂入鹿头关。”<sup>25</sup>其中溺死者在《旧五代史·康延孝传》中的记载是“步军溺死者亦千余人”<sup>26</sup>。总之，最后留下了千余人，这千余人当同时包含骑兵和步兵，即初始的 13000 人耗减至这个数目。

其他人中，李曦虽为凤翔节度使，但任“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当不统军，甚至“竭凤翔蓄积以馈军，不能充”<sup>27</sup>。张筠任“安抚应接使”，当亦无统兵之任，并在平蜀后归洛阳为河南尹。李令德为后梁降将朱友谦之子，赐姓李，入蜀后当率部驻守遂州，任武信军节度使，后因父友谦受谗被杀而遇害于遂州。<sup>28</sup>毛璋在克蜀后随魏王继岌出川，其在蜀地行踪不详<sup>29</sup>。董璋入蜀后率部驻守梓州，任东川节度使。

最后，魏王继岌的中军，其人数根据日后征讨康延孝之乱时所调 7000 人为中军精兵来看，则在 7000 人以上。<sup>30</sup>其将领按出征时的安排来看，“以梁汉颢充中军马步都虞候兼马步军都指挥使，张廷蕴为中军步军都指挥使，牛景章充中军左厢马军都指挥使，沈斌充中军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卓瓌充中军左厢步军都指挥使，王贲充中军右厢步军都指挥使”<sup>31</sup>，此数人在伐蜀过程中的各自具体经历不详，但日后皆随魏王继岌出川。其中，张廷蕴原是魏博李嗣源麾下将领，战功卓著，与梁汉颢在《旧五代史》俱有专传。牛景章、卓瓌、王贲三人不详，沈斌或即后晋时期与契丹交锋时死难的祁州刺史沈斌<sup>32</sup>，则亦回中原。

## （二）魏王继岌出川与孟知祥入蜀

如上所述，随魏王继岌入蜀的不到六万将士，李绍琛的先锋部队剩下 1000 余人，李令德、董璋所部分别驻守遂州与梓州，李令德后为董璋所杀，其部当归入董璋麾下。郭崇韬和毛璋等当随魏王继岌及其中军将士入驻成都，直到天成元年（926）正月魏王继岌诛杀郭崇韬后，准备出川。此时的后唐军队，应当吸收了许多前蜀降军，但降军的作用多为助守蜀地。因此，随魏王继岌出川的将士应该还是在六万人之内。在这其中，除了李令德和董璋驻守在外的军队以外，魏王继岌的部署如下：

魏王继岌留马步都指挥使陈留李仁罕、马军都指挥使东光潘仁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浚仪张业、牙内指挥使文水武漳、骁锐指挥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

<sup>24</sup> 《旧五代史》卷 33《庄宗纪七》，第 458 页。

<sup>25</sup> 《资治通鉴》卷 274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十一月条，第 8944 页。

<sup>26</sup> 《旧五代史》卷 74《康延孝传》，第 968 页。

<sup>27</sup> 《资治通鉴》卷 273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十月条，第 8939 页。

<sup>28</sup> 《旧五代史》卷 63《朱友谦传》，第 847 页。

<sup>29</sup> 《旧五代史》卷 73《毛璋传》，第 959 页。

<sup>30</sup> 《资治通鉴》卷 274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条，第 8961-8963 页。

<sup>31</sup> 《旧五代史》卷 33《庄宗纪七》，第 457 页。

<sup>32</sup> 《资治通鉴》卷 284 后晋齐王开运二年二月条，第 9284 页。

甲申，继岌发成都，命李绍琛帅万二千人为后军，行止常差中军一舍。<sup>33</sup>

此时，郭崇韬已死，全军受魏王继岌调遣，并“以（任）圜代将其军而旋”<sup>34</sup>，且分成三大部分：1，魏王继岌所率中军，其将领当是梁汉颺、张廷蕴等人，已如上述；2，李绍琛所帅12000人为后军，史载，此时“绍琛所将多河中兵”<sup>35</sup>；3，留戍成都的李仁罕等人所率军队，其人数据《新五代史》，“初魏王继岌东归，留精兵五千戍蜀”<sup>36</sup>，则李仁罕等人所率有5000精兵，且从数位将领所任职来看，当以骑兵为主。

另外，魏王继岌是在同月孟知祥入成都后启程的，故而当时成都还有孟知祥所部。关于孟知祥入蜀所带人马详情，并无史料直接显示，但我们可以从后蜀开国将相中求知一二。对此，顾立诚已经举出几例，为并州伊延瓌、潞州韩昭运、太原范仁恕<sup>37</sup>，而纪宇谦则从后蜀创业集团的视角统计了孟知祥元从，除了伊延瓌、韩昭运外，还有太原张公铎、太谷庞福诚、太原高彦俦、太原李廷珪、太原王彦铎、太原李奉虔、并州安思谦、潞州韩保贞·韩保升兄弟。<sup>38</sup>此外，纪宇谦划入后唐官员行列的沧州焦彦宾、定州赵进，其实也是随孟知祥入蜀者。如焦彦宾，“及庄宗即位，迁左监门卫将军，充四方馆使。出护邢州兵。知祥移镇成都，诏以彦宾为监军使，与知祥同入蜀”<sup>39</sup>；赵进，“属庆州叛，遣进讨平之，迁雅州刺史。知祥入蜀，进来觐谒……知祥纳之”<sup>40</sup>。

以上共14人，并州或太原人有8位，占了七分之四，可见与孟知祥入蜀者，大半为其在太原任北都留守时的部下，且大多为武将，则孟知祥入蜀时，所带随从当为颇有规模的一支军队。又从焦彦宾曾“出护邢州兵”而与孟知祥同入蜀可知，孟知祥与家乡邢州的关系尚未断绝，或有邢州兵跟随入蜀。而韩昭运、韩保贞、韩保升父子兄弟三人的潞州人身份，也显示出跟随孟知祥入蜀的还有泽潞地区之人，泽潞是其父辈经营的地方，当有不少势力。

于是，此时成都城有三大势力：一为孟知祥所部。二为李仁罕等人所部，由于孟知祥出任西川节度使，因此李仁罕等人所部此后归入孟知祥麾下，李仁罕、潘仁嗣、赵廷隐<sup>41</sup>、张业、武漳、李延厚皆于《九国志·后蜀》有传。此外，据本传，魏王继岌初入蜀时，“令

<sup>33</sup> 《资治通鉴》卷274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正月条，第8957页。

<sup>34</sup>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8《任圜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06页。

<sup>35</sup> 《资治通鉴》卷274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条，第8961页。

<sup>36</sup> 《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第799页。

<sup>37</sup> 顾立诚引《范文正公集》卷13《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师谥忠献范公墓志铭》，“太原人……皇考讳某，后唐初为校书郎，并帅孟公器之，尝辟之幕中，后又从孟公入蜀，霸业既成，遂为国相”。又据《宋史》本传，范雍曾祖范仁恕“仕蜀为宰相”，见脱脱等：《宋史》卷288《范雍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678页。又据范镇《范忠献公雍神道碑》，“皇考讳仁恕，事后唐为校书郎。从孟氏辟于并门，卒与俱入蜀，遂相之。以老，授太子太保，终于家。及公之贵，累赠太保。”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872，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40册，第300页。关于范仁恕的行实，参见吴任臣：《十国春秋》卷52《范仁恕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776-777页。

<sup>38</sup> 纪宇谦：《前后蜀创业集团暨中央权力结构之研究》，第120-122页；樊文礼也从孟知祥分割代北集团势力的视角予以揭示，见氏著：《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237-238页。

<sup>39</sup> 路振：《九国志》卷7《焦彦宾传》，傅璇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3318页。

<sup>40</sup> 《九国志》卷7《赵进传》，第3318页。

<sup>41</sup> 赵廷隐为从魏王继岌入蜀，见《九国志》卷7《赵庭隐传》，第3302页。而非从孟知祥入蜀，见《宋史》卷479《赵崇韬传》，第13886页。

（李仁罕）监先锋军”<sup>42</sup>，“以（赵）庭（廷）隐为先锋监押”<sup>43</sup>，“以（张）业监先锋兵”<sup>44</sup>，则此三人入蜀时在李绍琛麾下充当监军将领角色，并在平蜀后结束监军任务，留戍成都。第三大势力为蜀兵，据《资治通鉴》，“初，郭崇韬以蜀骑兵分左、右骁卫等六营，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宁远等二十营，凡二万四千人。”<sup>45</sup>这 27000 人后来也为孟知祥收编。

天成元年二月，李绍琛在麾下河中兵的刺激下造反，所部 12000 人经过向蜀人一番招谕后，“三日间众至五万”<sup>46</sup>。对此，魏王继岌的反应是，“以任圜为副招讨使，将步骑七千，与都指挥使梁汉颙、监军李延安追讨之。”<sup>47</sup>孟知祥的反应是，“知祥浚壕树栅，遣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将四万人，骁锐指挥使李延厚将二千人讨绍琛”，其中，李延厚本人又精简所部，“得选兵七百人以行”。至于李仁罕的四万人，胡三省注曰：“然当时蜀之旧兵败散已多，北兵留戍计不过数千，李仁罕所将未必及四万之数。更须博考。”<sup>48</sup>事实上，根据上文，郭崇韬所收编蜀兵已有 27000 人，则加上孟知祥本人所部和李仁罕、李延厚所率 5000 人，可以达到四万之数。

随后，在平定李绍琛之乱过程中，任圜先于汉州“大破之，斩首数千级”<sup>49</sup>，孟知祥又从李绍琛降兵中“获陕虢都指挥使汝阴李肇、河中都指挥使千乘侯弘实”<sup>50</sup>。则李绍琛所部 12000 人中除战死者外，当有一部分归入孟知祥麾下。当然，也不排除有李绍琛的部下继续随魏王继岌回京的。

李绍琛之乱平定后，天成元年（926）四月，“任圜将征蜀兵二万六千人至洛阳，明宗慰抚之，各令还营。”胡三省注曰：“征蜀之初，出师六万，除留戍于蜀及康延孝叛死亡之外，还洛者二万六千人耳。”<sup>51</sup>实际上，入蜀后与蜀军历次战斗死亡者亦不少，甚至跟随李绍琛渡河而死者亦有 1000 余人。

另外，在征讨李绍琛的过程中，东川董璋也参与在内，以此我们也得到了董璋的大致兵力，史载，“董璋将兵二万屯绵州，会任圜讨李绍琛”<sup>52</sup>。董璋的军队，自然不止两万，且包含着一部分随他从邠州来的将士，以及吞并李令德部所得。另外，天成四年九月，“邠州兵戍东川者归本道，董璋擅留其壮者，选羸老归之，仍收其甲兵。”<sup>53</sup>则留戍蜀地将士也有回本道的情况，但蜀地将领出于自保，能够全部放还的不多。

<sup>42</sup> 《九国志》卷 7《李仁罕》，第 2306 页。

<sup>43</sup> 《九国志》卷 7《赵庭隐传》，第 3302 页。

<sup>44</sup> 《九国志》卷 7《张业传》，第 3303 页。

<sup>45</sup> 《资治通鉴》卷 275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八月条，第 8991 页；又，后唐灭前蜀时，亦明确记载得兵三万，见《资治通鉴》卷 274 同光三年十一月条，第 8946 页。《十国春秋》记载步兵为二十万，杜文玉师已辨其非，见杜文玉：《前后蜀兵制初探》。

<sup>46</sup> 《资治通鉴》卷 274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条，第 8961 页。

<sup>47</sup> 《资治通鉴》卷 274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条，第 8961 页。

<sup>48</sup> 《资治通鉴》卷 274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条，第 8964 页。

<sup>49</sup> 《资治通鉴》卷 274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条，第 8964 页。

<sup>50</sup> 《资治通鉴》卷 274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三月条，第 8966 页。

<sup>51</sup> 《资治通鉴》卷 275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条，第 8983 页。

<sup>52</sup> 《资治通鉴》卷 274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条，第 8964 页。

<sup>53</sup> 《资治通鉴》卷 276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九月条，第 9032 页。

总之，经过后唐军队的一番征讨后，六万人中，除了任圜所带回的 26000 人和李绍琛的 12000 人，剩下包括李仁罕等人所率 5000 人和董璋所部在内的不到 22000 人当留在蜀中。但鉴于孟知祥的入蜀部队也随后吸纳了李绍琛的降卒，以及历次战斗死亡者，在蜀中留驻的戍兵当在两万左右。而这其中的沙陀人，当有不少。

### （三）后唐讨孟、董将士

如上所述，孟知祥与董璋在蜀中势力大增，导致长兴元年（930）后唐第二次伐蜀的失败。<sup>54</sup>第二次伐蜀的后唐将士，亦值得探讨其成份。

先看后唐所派驻的孟知祥、董璋之外的节度使，据《新五代史》，天成四年（929）：

自安重诲疑知祥有异志，听言事者，用己所亲信分守两川管内诸州，每除守将，则以精兵为其牙队，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备缓急。是岁，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分东川之阆州为保宁军，以李仁矩为节度使；又以武虔裕为绵州刺史。仁矩与东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诲表兄，由是璋与知祥皆惧，以谓唐将致讨。<sup>55</sup>

据此，安重诲所任命的遂州武信军节度使夏鲁奇、阆州保宁军节度使李仁矩、绵州刺史武虔裕，在入川时各有 500-3000 人的精兵随行。其中李仁矩的兵力，安重诲“遣姚洪将兵千人从仁矩戍阆州”<sup>56</sup>，则三人兵力共计在 2000-7000 之间。当然，安重诲任命的不止此三人：

利州昭武军。当孟知祥击退入川唐军时，“利州李彦珂闻唐军败东归，乃弃城走”<sup>57</sup>，则利州有李彦珂。李彦珂长兴二年就任，在他之前是天成四年就任的康思立、天成元年十一月就任的张温、同光三年就任的张敬询<sup>58</sup>，其中张敬询为郭崇韬所任命，张温为朝命，李彦珂和康思立当时安重诲安排。

夔州宁江军。孟知祥遣“李仁罕进攻夔州，刺史安崇阮弃城走”<sup>59</sup>，则夔州有安崇阮。在安崇阮之前，宁江军节度使为西方邺，西方邺于天成二年七月从荆南高季兴手中收复峡内夔、忠、万三州，又于天成四年四月死于任上，安崇阮当在此后受任。高季兴侵占三州之前，三州在后唐灭前蜀时主动纳降，后唐以李绍文为节度使，高季兴当取三州于李绍文手。<sup>60</sup>其中，李绍文为遂郭崇韬入蜀者<sup>61</sup>，西方邺为后唐明宗征讨高季兴时入蜀者<sup>62</sup>，安崇阮则以“诸

<sup>54</sup> 曾国富：《后唐对蜀战争浅析》，《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1 期，第 18-21 页。

<sup>55</sup> 《新五代史》卷 64《后蜀世家》，第 800-801 页。

<sup>56</sup> 《新五代史》卷 51《董璋传》，第 575 页。另外，安重诲又有派荀咸义将兵增援阆州之举，不过荀咸义未到阆州，董璋已经举兵攻阆州，见《新五代史》卷 26《李仁矩传》，第 285-286 页。

<sup>57</sup> 《新五代史》卷 64《后蜀世家》，第 801 页。“李彦珂”或为“李彦琦”，见《资治通鉴》卷 277 后唐明宗长兴二年二月条，第 9055 页。

<sup>58</sup> 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利州”，中华书局，1997 年，第 592 页。

<sup>59</sup> 《新五代史》卷 64《后蜀世家》，第 801 页。

<sup>60</sup> 《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夔州”，第 583-584 页。

<sup>61</sup> 《旧五代史》卷 59《李绍文传》，第 799 页。

<sup>62</sup> 《旧五代史》卷 61《西方邺传》，第 824 页。

卫上将军”授黔南节度使，再移镇夔州，<sup>63</sup>或即安重诲所任命。

黔州武泰军。孟知祥将张武遣朱偓进攻涪州时，“武泰节度使杨汉宾弃黔南”<sup>64</sup>，则涪州有杨汉宾。杨汉宾于天成四年五月代安崇阮任武泰军节度使<sup>65</sup>，当亦安重诲之安排。

渝州。孟知祥遣张武攻渝州时，“刺史张环降之”<sup>66</sup>，则渝州有张环。张环之前，或为宋彦筠任刺史，史载，“伐蜀之役，率所部从康延孝为前锋，蜀平，历维、渝二州刺史。明宗在位，连典数郡。”<sup>67</sup>宋彦筠当为郭崇韬所署置，明宗即位后征还，由张环代之。

除了征讨孟、董之前所布置兵力，在长兴元年九月董璋与孟知祥先后起兵后，后唐朝廷“命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都招讨使，夏鲁奇为副”<sup>68</sup>，又“庚寅，以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为西都留守兼行营马步都虞候，为伐蜀前锋”<sup>69</sup>。又，“石敬瑭入散关，阶州刺史王弘贄、泸州刺史冯晖与前锋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军都指挥使赵在礼引兵出人头山后，……甲戌，……还保剑门。”<sup>70</sup>其中王弘贄等人的兵力，据史载，“官军万余人自北山大下”<sup>71</sup>，则为 10000 余人。

于是，遂州、阆州、绵州、利州、夔州、黔州、渝州（含情况不明的泸、涪、集<sup>72</sup>、合、巴、蓬、果、忠、万等州），外加石敬瑭，兵力当在 14000-29000 之间。其中粟特系沙陀人当有不少，如守将安崇阮等。正如《新五代史》卷 24《安重诲传》所言，“唐兵戍蜀者，积三万人”<sup>73</sup>。

不过，此时孟知祥与董璋本身势力经过数年发展，已经今非昔比，与前蜀军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数路后唐军队依次溃败，武虔裕被囚，夏鲁奇自杀，李仁矩被杀，李彦珂、安崇阮、杨汉宾弃城，张环投降。<sup>74</sup>张环之外，其他人帐下也有部分将士留在蜀地，如李彦珂帐下卒、潞州人申贵等。<sup>75</sup>总之，这两万左右后唐第二次伐蜀军队，除了偶有投降之外，大部分都退出了蜀地。

此后，孟知祥又吞并董璋所部，除了两者之间战争损耗数千人之外，董璋余众投降者先后共一万人，则留居蜀地的沙陀人又归并在一处。<sup>76</sup>

<sup>63</sup> 《旧五代史》卷 90《安崇阮传》，第 1186 页。

<sup>64</sup> 《资治通鉴》卷 277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十一月条，第 9052 页。

<sup>65</sup> 《五代十国方镇年表》“黔州”，第 578 页。

<sup>66</sup> 《资治通鉴》卷 277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十一月条，第 9049 页。

<sup>67</sup> 《旧五代史》卷 123《宋彦筠传》，第 1623 页。

<sup>68</sup> 《新五代史》卷 64《后蜀世家》，第 800 页。

<sup>69</sup> 《资治通鉴》卷 277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九月条，第 9047 页。

<sup>70</sup> 《资治通鉴》卷 277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十一月条，第 9049 页。

<sup>71</sup> 《资治通鉴》卷 901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十一月条，第 9051 页。

<sup>72</sup> 《资治通鉴》卷 277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十月条，第 9048 页。“东川兵陷征（集）、合、巴、蓬、果五州”，其中“征”字当为“集”字之讹，见王文才、王炎：《蜀梲校笺》卷三《后蜀先主》，巴蜀书社，1999 年，第 290 页。

<sup>73</sup> 《新五代史》卷 24《安重诲传》，第 254 页。《资治通鉴》亦曰：“及知祥克遂、阆、利、夔、黔、梓六镇，得东兵无虑三万人”，这里虽包含了董璋的部分，但也能反映后唐派驻蜀地的兵员情况，见《资治通鉴》卷 278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八月条，第 9076 页。

<sup>74</sup> 《资治通鉴》卷 277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四月条，第 9040-9057 页。

<sup>75</sup> 《九国志》卷 7《申贵传》，第 3320 页。

<sup>76</sup> 《资治通鉴》卷 277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五月条，第 9070 页。

## 二 五代蜀地粟特系沙陀人考

上文中，笔者考察了随后唐军队历次征蜀的将士最终定居蜀地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其中的粟特系沙陀人。当然，本文并非专门考察孟蜀，虽然不是沙陀王朝将士建立的政权，王蜀时期也有粟特人的存在，对此先予以揭示：

### （一）前蜀时期粟特人

前蜀政权由来自于秦宗权集团的王建所建立，其周围多许州军将，或来自岐王李茂贞和荆南高季兴的降卒，故而粟特人很是少见。<sup>77</sup>约有以下数例：

史氏。据《九国志》：“（王宗翰）性残虐吝嗇，刺彭州日，部民史氏，有胡让庄，号为沃饶，宗翰杀史氏而取之。”<sup>78</sup>史氏所营“胡让庄”，以“胡”为名，而又姓史，自然是粟特人无疑。并且史氏有此沃饶产业，当在蜀地经营时间颇长，粟特人以经商著名，史氏当延续此传统，可惜被王宗翰所杀。

石灏。据《北梦琐言》：“唐昭宗劫迁，百官荡析，名娼伎儿，皆为强诸侯有之。……复有琵琶石灏者，号‘石司马’。自言早为相国令狐公见赏，俾与诸子涣、胤连水边作名也。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一日，会军校数员饮酒作欢，石灏以胡琴擅场，在坐非知音者，諠哗语笑，殊不倾听。灏乃扑槽而诟曰：‘某曾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蒙我听，何其苦哉！’于时识者亦叹讶之。”<sup>79</sup>此则故事被吴任臣采入《十国春秋》前蜀部分<sup>80</sup>，当因其中“皆为强诸侯有之”和“军校数员饮酒作欢”等语，且时间上亦能衔接。而对笔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石灏姓石，又“以胡琴擅场”，当是粟特胡人。不过石灏本人的人生境遇不佳，在蜀地也郁郁不得志。

安悉香。前蜀废太子王元膺所用伶人，在元膺与王建嬖臣唐袭争权时与元膺及其军将喻全殊一起率天武神机营自卫。<sup>81</sup>安悉香出身不明，但从其姓氏来看，属于粟特人的可能性很大。且粟特胡人中，亦多以伶人为职业者。<sup>82</sup>

石某。据《玉堂闲话》载：

秦骑将石某者，甚有战功。其妻悍且妬，石常患之。后其妻独处，乃夜遣人刺之。妻手接其刃，号救叫喊，婢妾共击贼，遂折镡而去，竟不能害，如十指皆伤。后数年，

<sup>77</sup> 关于王建集团的成员组成，参见纪宇谦：《前后蜀创业集团暨中央权力结构之研究》，第46-107页；Hongjie Wang（王宏杰），*Power and Politics in Tenth-Century China: the Former Shu Regime*, Cambria Press, 2011, pp.79-93.

<sup>78</sup> 《九国志》卷6《王宗翰传》，第3285页。

<sup>79</sup> 孙光宪：《北梦琐言》，中华书局，2002年，第144页。

<sup>80</sup> 《十国春秋》卷45《石灏传》，第657页。

<sup>81</sup> 《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第789页。

<sup>82</sup> 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9-119页。

秦亡入蜀，蜀遣石将兵，屯于褒梁，复于军中募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数千里，侠士于是挟刃，怀家书，至其门曰：“褒中信至，令面见夫人。”夫人喜出见，侠拜而授其书。捧接之际，挥刃斫之。妻有一女跃出，举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外人闻而救之，女十指并伤。后十年，蜀亡，归秦邦，竟与其夫偕老，死于牖下。<sup>83</sup>

这位石某是秦州骑将，以其姓氏来看，很可能是粟特人，惜名字不详<sup>84</sup>。另外，这里虽然没有明言蜀是前蜀还是后蜀，但从石某入蜀之后，“后十年，蜀亡”来看，当是前蜀，前蜀于永平五年（915）取秦州<sup>85</sup>，十年后亡国。另外，故事本身能够提供其他一些信息，比如石某入蜀之后，当安家于成都，而将兵屯于梁州，故有“褒、蜀相去数千里”之语。但石某在前蜀政权似乎没有显赫的战功，蜀亡时也无反抗之举，从而能够与其妻子偕老故里。

石钦若父子。据《北梦琐言》载：

后又有名石钦若者，体效其笔，为刘知俊判官，随轩降蜀，不能谦退远害，冥主争露锋颖，竟同诛之。阅其緘题表章行行然，宜其见忌而取祸也。<sup>86</sup>

石钦若在后梁将领刘知俊（？-917）帐下为判官，刘知俊先降李茂贞，又叛李茂贞而入蜀。虽然不知其是否为粟特人，但从姓氏来看有很大可能。祇是刘知俊和石钦若不懂得“谦退远害”，从而皆遭杀害。<sup>87</sup>此外，石钦若还有子孙留在蜀地，据《宋史·李昊传》：“（孟）昶欲命昊二子官，昊固让，且言：‘遂州判官石钦若、苏涯，前蜀时，同在刘知俊幕下，愿回授钦若等子。’昶嘉叹，许之，仍授昊二子官。”<sup>88</sup>可知石钦若的子嗣虽然并未因父亲的原因而遭祸害，但也没有官职在身，所以受到李昊的推荐才任官。

安重霸。《旧五代史》本传载其在前蜀事迹如下：

安重霸，云州人也。性狡谄，多智算。初，自代北与明宗俱事武皇，因负罪奔梁，在梁复以罪奔蜀，蜀以蕃人善骑射，因为亲将。蜀后主王衍，幼年袭位，其政多僻。宦官王承休居中用事，与成都尹韩昭内外相结，专采择声色，以固宠幸。武臣宿将，居常切齿。重霸谄事承休，特见委信。梁末，岐下削弱，蜀人独取秦、成、阶等州，重霸说承休求镇秦州。仍于军中选山东骁果，得数千人，号龙武都，以承休为军帅，重霸副焉，俱在天水。岁余，承休欲求旄钺，乃以陇西花木入献，又称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

<sup>83</sup> 王仁裕：《玉堂闲话》卷3“秦骑将”条，《五代史书汇编》第四册，第1879页。

<sup>84</sup> 《玉堂闲话》卷4有一则石从义的故事，开头曰：“秦州都押衙石从义家”，或即此石某，然不敢遽定。见《玉堂闲话》卷4“石从义”条，第1905页。

<sup>85</sup> 《五代十国方镇年表》“秦州”，第236页。

<sup>86</sup> 《北梦琐言》卷7“王超笺奏条”，第159页。

<sup>87</sup> 《旧五代史》卷13《刘知俊传》，第179-180页。

<sup>88</sup> 《宋史》卷479《李昊传》，第13891页。

请后主临幸，而韩昭赞成之。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众数万，由剑阁将出兴、凤，以游秦州。至兴州，遇魏王继岌军至，狼狈而旋。承休遽闻东帅入讨，大恐，计无从出，问于重霸。对曰：“开府何患？蜀中精兵，不下十万，咫尺之险，安有不济，纵东军尽如狼虎，岂能入剑门！然国家有患，开府特受主知，不得失于奔赴，此州制置事定，无虞得失，重霸愿从开府赴阙。”承休素信以为忠赤。重霸出秦州金帛以赂群羌，买由文山路归蜀。承休拥龙武军及招置仅万人从行，令重霸权握部署，州人相送，秦州军亦列部队。承休登乘，重霸马前辞曰：“国家费尽事力，收获陇西，若从开府南行，陇州实时疏失，请开府自行，重霸且为国守藩。”承休既去，重霸在秦州，闻明宗起河北，实时遣使以秦、成等州来降。……重霸之子曰怀浦，晋天福中，为禁军指挥使。契丹寇澶州，以临阵怩，为景延广所诛。<sup>89</sup>

从安重霸的经历来看，他从晋国奔梁，由从梁奔蜀，称得上“狡谲”与“智算”。而且虽然他在前蜀政权以“蕃人善骑射”而为亲将，但却“谄事承休”，又在前蜀政权风雨飘摇的情况下，用计据保秦州并适时向后唐明宗投诚。可见，对于前蜀政权来说，他并未作出多少贡献，虽然取走了号为“龙武都”的数千精兵，却不进攻后唐伐蜀军队，加速了其灭亡。且他似乎并无真正的战场经验，以致于他的儿子安怀浦竟然因“临阵怩”而被诛。此外，安重霸入后唐后“好赂遗”，而这在前蜀时期就已经有劣迹：

葆光子曰：“蜀简州刺史安重霸黠货无厌，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邓，能棋，其力粗贍。安辄召与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后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效而自求退？’邓生然之，以中金十铤获免。良可笑也。”<sup>90</sup>

安重霸何时任简州刺史史无明言，但当在赴秦州之前，而王承休于前蜀乾德六年（923）任秦州天雄军节度使<sup>91</sup>，则安重霸在此前某年任简州刺史。

安重进。安重进为安重霸的弟弟，也曾在数个政权之间辗转。关于安重进，有两则详略不同的材料：

《旧五代史》：弟重进，尤凶恶，事庄宗，以试剑杀人，奔淮南。重霸在蜀，闻之蜀主，取之于吴，用为裨将，随重霸为龙武小将，戍长道，又杀人，奔归洛阳。<sup>92</sup>

《玉堂闲话》：有安道进者，即故云州帅重霸季弟，河东人也。性凶险。庄宗潜龙

<sup>89</sup> 《旧五代史》卷 61《安重霸传》，第 819-820 页。

<sup>90</sup> 《北梦琐言》卷 1“日本国王子棋”条，第 21 页。

<sup>91</sup> 《五代十国方镇年表》“秦州”，第 238 页。

<sup>92</sup> 《旧五代史》卷 61《安重霸传》，第 820 页。

时，为小校，常佩剑列于翊卫。忽一日，拔而玩之，谓人曰：“此剑也。可以剗钟切玉，孰敢当吾锋镞？”旁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器，妄此夸谭。假使吾引颈承之，安能快断乎？”道进曰：“真能引颈乎？”此人以为戏言，乃引颈而前，遂一挥而断。旁人皆惊散。道进携剑，日夜南驰，投于梁主。梁主壮之，俾隶淮之镇戍。有掌庾吏，进谓曰：“古人谓洞其七札为能，吾之铍镞，可彻其十札矣，尔辈安知之。”吏轻之曰：“使我开襟俟之，能彻吾腹乎？”安曰：“试敢开襟否？”吏即开其襟，道进一发而殪之，利镞径过，植于墙上。安蓄一犬一婢，遂掣而南奔，昼则从于芦荻中，夜则望星斗而寤。又时看眼中神光，光多处为利方，光少处为不利。既能伏气，遂绝粒，经时抵江湖间，左挈婢，右携犬，而辘浮渡，殊无所损。淮帅得之，擢为裨将，赐与甚丰。时兄重霸事蜀，亦为列校，闻弟在吴，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发一介以请之。迨至蜀，亦为主将，后领兵戍于天水营长道县。重霸为招讨马步使，驻于秦亭县。民有爱子，托之于安，命之曰斤子。道进适往户外，斤子偶经行于寝之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斩而投于井。其家号诉于霸，传送招讨使王公。至于南梁，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及憾其元昆，又欲加害其家族，兄家闲卜户防之。蜀破，道进东归，明宗补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有过，鞭背卒。<sup>93</sup>

在这里，从安重霸的名字来看，《玉堂闲话》的安道进当即《旧五代史》的安重进，至于“季弟”与“弟”之别，则可以忽略。另外，《玉堂闲话》中的“王公”即王承休，“淮帅”则为杨行密父子，具体待考。安重进此人，颇类其兄，《玉堂闲话》所载两则在河东和梁的杀人故事，已充分显露其“凶险”，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发生在杨吴政权，但以其在蜀地杀人的例子来看，估计在杨吴境内时间一久，也会闹出事情。另外，从笔者对杨吴政权境内的沙陀人所进行的考察来看，安重进这种性格恐怕也是容身不下的，估计会像安仁义（？-905）一样引火上身。虽然《玉堂闲话》说“淮帅得之，擢为裨将，赐与甚丰”，但毕竟没有如其他沙陀将领一样领兵出征甚而贵为一方州牧，杨吴史籍中也未曾有关于他的记载。<sup>94</sup>安重进的下场，也是因其有过而被鞭背卒，估计也是因为凶险之事。

## （二）后蜀时期粟特系沙陀人

如上文所述，后蜀政权建立的基础是第一次伐蜀将士和孟知祥入川所携部众，故而其中当有一定数量的沙陀人，从而也有粟特人后裔在内。现分别考察之：

安思谦父子。安思谦父子是后蜀时期最活跃的粟特系沙陀人，也可以作为随孟知祥入蜀的粟特系沙陀人之代表性人物，据《九国志》本传：

思谦，并州人。幼事知祥于太原，以勤恪闻。知祥入蜀，补为军校。昶袭位，颇

<sup>93</sup> 《玉堂闲话》卷3，第1876-1877页。

<sup>94</sup> 胡耀飞：《出入杨吴政权之“空间转移”：以沙陀武将为例》。

见亲信，历简、邛、彭三州刺史、奉天控鹤马步军都指挥使、武泰军节度使。未之任，改匡圣马步军都指挥使、山南节度。时凤翔监军王景崇以城归顺，命思谦率兵应接，且略地关中。会汉兵围凤翔，烧其双门，景崇遣使来求救，昶遣思谦及韩保贞等率兵救之。兵次右界，汉兵屯宝鸡城。思谦令保贞分兵趋陇州，逼汧阳，以分其势。又遣先锋将申贵等，分兵走摸壁，设伏时家林。贵以数百人晨压宝鸡，列阵以诱汉兵。汉兵争出战，贵伪遁，汉兵逐之，为伏卒所击，退入宝鸡城。思谦次渭水，将引军济。会罗曷保义军与东相应，掩我不备，多杀士卒，而汉兵复振。思谦与诸将议曰：“粮储将尽，而贼势且盛，不如释之以图后举。”遂班师。十二月，景崇又来告急，昶复督思谦令进兵。思谦请先运粮四十万斛，然后进军。昶览表不悦，谓左右曰：“古之良将，因敌取资。近者契丹以数十万众入中原，岂先事飞挽耶？揣思谦此意，必不为朕进取也。”乃发兴州乾渠渡粮食，及山南诸仓米数万斛，屯凤州以益之。思谦不得已，遂进军。次大散关，申贵以所部先进击。汉兵烧箭箐寨，毁阁道遁去。贵尽锐追之及安都，思谦进军玉女潭，又杀汉兵千人。汉兵退屯宝鸡城，思谦驻军摸壁。时保贞之师，攻陇州不能下，思谦遂迁延不进。会汉兵陷凤翔，景崇死，乃班师上表待罪。昶释不问，召归移镇阆州，仍留宿卫。思谦以受任无状，为物议所薄，颇不自安。昶既诛张业，宫禁门卫，悉加严警。思谦以其疑己，颇恶之，言多悖慢。三子宸、嗣、裔，恃父权恣横，国人畏之。会翰林王藻乘间奏思谦出怨言，将图不轨。昶惧，翌日俟其入朝，伏壮士击杀之，并其三子，广政十七年也。<sup>95</sup>

安思谦出仕孟氏两世，并在孟昶袭位后“颇见亲信”，然而在一次出师无功，一次未出师先请运粮之后，开始收到疑忌，加上他自己也并不懂得避祸远害，从而导致父子四人被族诛。当然，安思谦的得祸与其粟特人身份可以说毫无关系，而是孟昶本人即为一位性好猜忌功臣之人，许多有功之臣皆遭枉死。虽然孟昶的形象经过了后人的篡改<sup>96</sup>，但孟昶因猜忌而杀功臣毕竟是事实，从而间接导致了蜀亡。<sup>97</sup>此外，安思谦三子名安宸、安嗣、安裔，然而据宋初《野人闲话》，“彭州天台禅院，前致仕焦将军彦宾所创也，天台僧行灯掌之。刺史安思谦男守范，与宾客游，联句以纪其来。……果五年，诛思谦，守范伏法，鼎夫暴亡，……杨鼎夫，成都人，……后为居安思谦幕，判成都榷盐院，感疾暴亡，以盐裹其尸归于蜀。”<sup>98</sup>则安思谦有子名守范，或即三子中一人之更名乎？更待详考。

康文通。康文通于后唐第二次进攻蜀地时归降于孟知祥，史载，“李仁罕围遂州，夏鲁奇婴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帅资州义军二万人筑长城环之。鲁奇遣马军都指挥使康

<sup>95</sup> 《九国志》卷7《安思谦传》，第3317-3318页。

<sup>96</sup> 张邦炜：《昏君乎？明君乎？——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sup>97</sup> 纪宇谦：《前后蜀创业集团暨中央权力结构之研究》，第171-175页。

<sup>98</sup> 耿焕：《野人闲话》“安守范”条，《五代史书汇编》第十册，第6011-6012页。

文通出战，文通闻阆州陷，遂以其众降于仁罕”<sup>99</sup>。康文通后事不详，但留于蜀地当无疑。

石奉顓。关于石奉顓，有两则故事，据《资治通鉴》，天福十二年（947）四月：“乙亥，凤州防御使石奉顓举州降蜀。奉顓，晋之宗属也。”又据《新五代史》，乾德三年（965）正月：“昶问计于左右，老将石顓以谓东兵远来，势不能久，宜聚兵坚守以蔽之。昶叹曰：‘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邪！’乃命李昊草表以降。”<sup>100</sup>对于《新五代史》的记载，《宋史》的名字是“石斌”<sup>101</sup>，《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名字是“石奉顓”<sup>102</sup>。综合而言，则《宋史》的“石斌”或为“石贇”之误，“贇”与“顓”通，则“石斌”即“石顓”，亦即“石奉顓”。当然，《十国春秋》直接记载为“石奉顓，一名顓”，列举两则故事之后，以“后主不能从，顓竟不知所在”为结语。<sup>103</sup>此外，从石奉顓入蜀到蜀亡的近二十年间，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并不在外镇守，逐渐成为并无重任在身，但依旧有些威望的“老将”。

康祚。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四年（966）：“是岁，……丁德裕与西川兵马都监潞城张延通同帅师擒贼都统康祚”<sup>104</sup>，可知被宋人诬为“贼都统”的康祚，或为参与全师雄反抗宋人统治的后蜀灭亡后留居蜀地将领之一员。但其后蜀时期事迹不详。

石钦若子。如前文所述，石钦若子受李昊推荐而居官，但具体名字与经历不详。

此外，非粟特人，但又能明显得知其属于沙陀共同体的人物，亦可考察如下：

沙延祚。史载，后唐军队进攻龙州时，为孟知祥部西川“义胜都头太原沙延祚所败”<sup>105</sup>。身为太原人的沙延祚，从其姓氏来看，当为沙陀人后裔。沙陀又称沙随，沙随曾一度成为部族首领的姓氏<sup>106</sup>，当恢复为朱邪后，估计也会有坚持使用沙随，然后简化为沙氏的。不过沙延祚本人的信息似乎仅此一则。

何重建（何建）。据《九国志》本传曰：

何重建，其先回纥之别部，居云、朔间。祖允庆，父怀福，从后唐武皇，世著勋阃，因家于太原。重建初事晋祖，……未几移镇秦州。广政十年，契丹犯中原，虜使赉伪诏至，重建不胜其愤，谓将吏曰：“吾事石氏二主，八拥旄节，人臣之荣已极矣，岂能交臂以事戎狄？”乃斩其使，以秦、成、阶三州归款于我。昶遣右千牛卫上将军李继勋驰往慰谕，赐予甚厚，加特进、同平章事，依前雄武军节度使。时固镇与凤州未平，重建悉经略讨平之。昶大举兵北伐，遣张虔钊出大散关，以重建为招讨使，由陇州路以

<sup>99</sup> 《资治通鉴》卷 277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十月条，第 9047 页。

<sup>100</sup> 《新五代史》卷 64《后蜀世家》，第 807 页。

<sup>101</sup> 《宋史》卷 479“西蜀孟氏”，第 13876 页。

<sup>102</sup>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6 乾德三年春正月条，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44 页。

<sup>103</sup> 《十国春秋》卷 53《石奉顓传》，第 788 页。

<sup>104</sup>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7 乾德四年条，第 183 页。

<sup>105</sup> 《资治通鉴》卷 277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十一月条，第 9052 页。

<sup>106</sup> 樊文礼：《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民族研究》，1999 年第 6 期。

进师，无功而还。坚请入覲，昶不许。二十一年，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九。<sup>107</sup>

何重建属于回纥别部，但因居云、朔间，当已融入沙陀共同体。此外，重建拒绝出仕契丹，所谓“岂能交臂以事戎狄？”则他本人已经淡化了自己的回纥血统，以中原人自居，所以选择了入蜀。不过，他广政十年方才入蜀，故而与孟知祥的元从可能并不相融，所以一直在外镇守，孟昶也不许其入覲。所以，他可能并未进入过地理意义上的蜀地，而祇是徘徊于秦州地区，但因为依然出仕后蜀政权，故而也可以视为蜀地粟特人。

另外，需要考辨的一则史料是《九国志》的记载，“及王师入成都，行营都监王仁贍按籍诘所在军资，将归罪于（李）廷珪。廷珪问计于部将康延泽，曰：‘吾观王公，志在声色，苟足其欲，则置而不问矣。’廷珪素俭约，不蓄妓乐，遂求于姻戚家，得女妓四人，复假贷金帛，直数百万，以遗仁贍，繇是豁免。”<sup>108</sup>其中，康延泽在此处的记载，或许会被认为是后蜀将领李廷珪本人的部将。然而，据《宋史》记载，此处语句为“行营都监王仁贍案籍诘所在军须，廷珪惧，以告马军都监康延泽。延泽曰”云云，<sup>109</sup>则康延泽当是宋军伐蜀行营马军都监，而非李廷珪部将。另外，康延泽本人在《宋史》有传，也记载其入蜀。<sup>110</sup>故而，如果以《九国志》为据认为康延泽是李廷珪部将，属于后蜀粟特系沙陀人将领的话，那恐怕就是误判了。

### 三 综论

如上文所述，唐末五代时期，蜀地粟特人和粟特系沙陀人的情况遂可一一附按，虽然笔者不敢保证其全面性，但也能从中对蜀地粟特系沙陀人进行一番综述：

#### （一）粟特人和粟特系沙陀人

粟特是中古时期居住于中亚粟特地区的一个民族，他们的活动范围因为其民族本身的商业、游牧性特质而遍及亚洲大陆。其中，进入唐朝内地并融入沙陀人的，则被称为粟特系沙陀人，虽然保留有一部分商业性，但更多地受到了沙陀人游牧性的影响，成为沙陀骑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讨论五代蜀地粟特人时，有必要对两者进行区分。在上文中，笔者笼统整理了前蜀、后蜀的粟特人和粟特系沙陀人，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1，粟特人。根据前文考察，前蜀时期蜀地粟特人甚少，且在蜀地的生活并不顺畅，伶人难遇知音，富户竟被破家，判官因疏狂而被害，武将也未能尽其效用。这种情况，当与前蜀政权的立国基础或有关系：第一，以武人政权面世的前蜀，对于伶人和富户恐怕不会很善待；第二，蜀地并非北方平原，沙陀骑兵的能力也无法充分展开，从而限制了沙陀武将的仕

<sup>107</sup> 《九国志》卷7《何重建传》，第3311页。又参见《旧五代史》卷94《何建传》，第1245-1246页。

<sup>108</sup> 《九国志》卷7《李廷珪传》，第3314页。

<sup>109</sup> 《宋史》卷479《李廷珪传》，第13890页。

<sup>110</sup> 《宋史》卷255《康延泽传》，第8926-8927页。

途；第三，王建创立前蜀所凭借的许州集团恐怕也容不下外来成员的分羹。

至于前蜀时期粟特人的来源，大致包括：一、世居蜀地经营者，如部民史氏家族；二、唐末因昭宗被各地强有力的藩镇争来夺去而流落蜀地者，如石湫等人，安悉香也可能是唐末流落蜀地者。另外，前蜀时期还有两类粟特人：三、从秦岐政权归顺者，如秦州骑将石某和刘知俊判官石钦若；四、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帐下辗转而来，如安重霸、安重进兄弟。从这几例来看，都是个人行为，不仅形成不了一个群体，也无法融入整个前蜀政权之中。

关于粟特人的研究，学界已经有很丰富的学术史供参考<sup>111</sup>，本文对部民史氏家族、石湫、安悉香等人的揭示，也仅仅是对学界已有成果的补充，并把这些人放在五代前蜀政权背景下来观察。其特点有二：首先，这几位粟特人无论是经商还是从艺，都明显有粟特人的民族特征，从而可以作为五代时期粟特人活动的例证；其次，他们流寓蜀地，境遇并不好，从而反映出在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人当权的时代背景下，商人和艺人的悲惨命运。因此，千年之后，我们能找到的史料实在有限。虽然根据姚崇新对巴蜀地区火祆教遗痕的考察，五代时期成都、巫山皆有祆庙存在，从一般百姓口中也能听到“灌口祆神”<sup>112</sup>，但毕竟只是零星的存在而已，更无法保存到今天。

2. 粟特系沙陀人。根据上文对后蜀时期蜀地粟特系沙陀人的考察。能够明确姓名的有四人，仅知姓氏的有一人，其他非粟特系沙陀人有两人。这个数字，相对于前文考证的两万入蜀留居将士来说，自然比例十分小，更何况石奉頵等人也并非随孟知祥入蜀，石钦若之子也是前蜀时期留居蜀地的粟特人后裔，但还是能够了解一个大概。总体上说，孟蜀时期并不存在大量粟特系沙陀人活动的迹象，从随孟知祥入蜀的将领来看，粟特人也只有安思谦一人，比例不高。但就已有几例情况看，后蜀时期粟特人以武将为主。

综上，后蜀时期蜀地粟特系沙陀人的来源有：一、后唐两次伐蜀后留居蜀地者，如康文通；二、随孟知祥入蜀者，如安思谦；三、从中原政权入蜀者，如石奉頵；四、前蜀时期入蜀粟特人之后裔，如石钦若之子。总这几例看，虽然人数少，但第一、第二种来源背后有两万左右军队为基数，只是我们无法获知其他粟特系沙陀人的详情。但根据本文前半部分的统计来看，在两万人的留蜀后唐将士中，沙陀人必定不少，其中粟特人也不会没有。

而之所以能留下名字的如此之少，恐怕原因有三：首先，后唐将士入蜀者，并不纯粹是沙陀骑兵，其中大部分当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统一北方后，整合北方各地所调步兵而编成的，以致于我们几乎看不到粟特系沙陀人将领；其次，孟知祥从太原带来的人马，在太原本地的沙陀人经过李克用、李存勖的大规模利用之后，已经所剩无几，大部分随着征服北方的军队

---

<sup>111</sup> 挂田良雄：《粟特的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88年；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关荣基：《粟特研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编委会编：《法国汉学》第十辑《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sup>112</sup> 姚崇新：《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火祆教遗痕》，第325-347页。

驻防各地，留居当地为孟知祥所用者甚少，所能知道的仅仅是安思谦而已；第三，后蜀立国于蜀地，并不是沙陀骑兵能够充分施展的舞台，后蜀建国之后又“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并不像中原那样战争频繁，所以粟特系沙陀人也很少有脱颖而出，从而留名史册者。

## （二）蜀地粟特系沙陀人所反映的族群流动现象

本文所关注的粟特人和粟特系沙陀人中，除开流寓蜀地的粟特人以外，其他粟特系沙陀人皆为进入前后蜀政权担任或大或小的人，虽然我们不能高估粟特系沙陀人对前后蜀政权的影响，但依然能够从中反映五代时期大环境对族群流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当一个地域性政权征服整个北方甚至全国时，此一地域的人会从而流向各地，正因此造成了沙陀人在中国北方的活跃。就征服北方而言，梁、唐、晋、汉、周这五个政权是很好的例子，若征服全国，则可以考察北宋政权。后唐对蜀地的征服，也导致了粟特系沙陀人向蜀地的流入，其途径为后唐第一次和第二次伐蜀以及孟知祥入蜀。

第二，当两个相邻地域性政权之间不断征战时，一方政权的将领或因战败，或因被谗而进入另一方政权，这也是秦岐政权数位粟特系沙陀人入蜀的原因。另外，安重霸、安重进兄弟和石奉顼，也可以归入此类。

当然，这两方面所造成的族群流动，其实也是有其反作用的。

就第一方面来说，某一地域或民族之人流向全国，则从全国而言，此地域之人在全国分布的密度变小，更加速了他们本身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减弱，沙陀人进入五代后的迅速汉化即有此种因素在内。作为本来在华北已经是少数族裔的沙陀人，其一部分进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蜀地之后，所占人口比重更加小，无法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就第二方面来说，一个政权的人进入另一个政权，无论是作为败军之将被俘还是所谓弃暗投明，都免不了受到各种认同感的困扰，以致于无法施展自身的能力，最终默默无闻。石奉顼一直不受重用，安重霸、安重进在前蜀政权也未见立有大功。